



张泽石：一家 5 口都成了右派



同遭厄运

”

作者简介：
张泽石，1929 年生，四川广安人，中共党员。1946 年考入清华大学，1947 年加入共产党。1951 年，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0 军 180 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 538 团团政治处宣教干事。1953 年 9 月作为最后一批交换战俘归国。

同遭厄运那个星期天，在允许我离校返家后，我和 E 带着儿子先回到她的家中，我请岳母照顾一下 E 和儿子，自己急忙赶回东单去看已半个多月未见到的爸妈。

这段时间我从报上看见全国规模的“反击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的大量报导，确实心惊肉跳，我担心亲人们的命运。

特别是他们又向我和 E 追查所谓“家中开黑会”问题，每读到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右派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之类的指斥，就更担心我们那种具有自由、民主气氛的家庭聚会。从父亲开始到我们兄妹平时追求进步，关心政治，喜欢各抒己见纵论天下事的“坏习惯”将带给我们可怕后果！

更何况我十分了解父亲，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所受的西方民主主义教育与对我们子女自小给予的民主思想的熏陶，还有解放前夕我带回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再加上我们全家所崇尚的士大夫对国家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历史感、责任感，使得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决不会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政治生活中的阴暗东西去装聋作哑，更不会俯首贴耳。

但这些在当时是太不合潮流了，太危险了！我在回家路上，想到这些就不寒而栗！

果然，一进家门就感到冷冷清清，兄嫂弟妹都没回来，妈妈急着问我情况如何，为什么那么久不回来？我只好说我们学校集中搞运动，都不许回家。

妈擦着眼泪告诉我：“你二哥、二嫂都挨整了，你爸他们农业部也给爸爸贴了大字报，老三，这怎么得了呀！”

“好多人都被贴了大字报，那只是一种公开提意见方式，平时难得听到下面的批评，来一点民主是好事嘛！”爸在旁说。

“爸那儿，您放心！爸是党外民主人士，又是邓小平同志吸收参加政府工作和调来中央的，我担任农业部油料处处长，很有成绩，去年在部里评上先进工作者，国庆节还上了天安门观礼，可见领导上在政治上对爸是充分肯定的，您完全不用担心！”

我竭力安慰妈，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我对爸妈说我去买点菜回来，便独自上了城墙。我心里难过极了，我为二哥、二嫂也被打成右派而非常痛苦、思绪万千！

我的二哥是一个正义感非常强，事业心也非常强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我想起 1948 年党组织将我从小华北解放区调回四川从事敌后武装斗争准备迎接解放，由于党的重庆市委遭到破坏，回川后，我失去组织联系，是他冒着危险留我在他当助教的四川大学，并将我介绍给中共川大地下党的。他那时虽同情党的政治主张，但不赞成党的阶级斗争路线。

他那时和父亲一起变卖了祖父留下的田产，成立了一个“世民服务社”（“为世界人民服务合作社”）在成都郊区乡下建立“合作小水轮电站”用来发电碾米，实验他们的乡村建设路线，希望以科技扶贫来减小农村贫富悬殊，来缓解阶级矛盾、来解决中国革命根本问题。

后来父亲和他都接受了我的“批评”，停止了“世民社”的“第三条路线活动”，转而坚决支持共产党！

他们不仅把两个机动水碾子都交给我们地下党做了交通站，他们自己也参加了党的地下斗争。

父亲在解放前夕根据党的指示在他当厂长的长寿秦安纱厂组织了武装护厂队防止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工厂，而二哥则尽自己力量支持我的活动。

其中最重要的是出面请他的同班同学王家佑，一位国军军长的公子送 10 块钢洋给我购置一台高效收音机的零件，又请他的同窗好友苏德坚替我设计装配，我正是用了那台收音机来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创办了川西地下党的机关报《火炬报》。

他们在解放前夕的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能积极拥护党的斗争，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倒会反起党来，这可能么？

还有我的二嫂，一个温柔、善良、聪明、勤奋的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北京医学院研究生，她去反党干什么？这些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我在那段城墙墙头上坐了好久好久，直到夕阳完全消失了它那曾经耀眼的光芒！

我还很不甘心曾跟我一起签名向中央军委写申诉信的、和我一起被俘归来的马兴旺营长、姜

瑞溥小兄弟。我得去看看他们。

马营长转业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做后勤工作，姜瑞溥当了一年工人后于去年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

我在第二天分别去见他们时，都先去看看院里墙上贴的许多大字报，结果都痛心发现了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

“啊！上帝，我们已经一起被俘受苦，现在又一起当了‘老右’，真是命中注定的难兄难弟！”

然而使我内心更加痛苦的是：老马与小姜跟我一样在集中营都是风云人物，是敌人眼中最顽固的共党分子、左倾分子，怎么现在都成了共产党眼中最顽固的反党分子，右倾分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标准么？我们自己究竟算是左还是右，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谁来判定？

特别是当我在那些批判老马的大字报中发现确实有一项可怕的罪名：“组织叛徒反党集团，阴谋向党中央为他们的叛国行为翻案！”

我真后悔不该建议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不仅解决不了原来的委屈，反而增加了新的冤情！

过了不久，又传来我的在炮兵学校任教的大哥被内定为右派分子，送往兴凯湖劳动的消息。

那时我又后悔不该在 1947 年请他从四川到北京来、通过清华大学地下党将他送往晋察冀解放区去参加解放军，他曾经是国民党远征军的炮兵士官，后来为反对打内战而开小差回家，一直要找共产党！我帮他找到共产党，现在却成了反党分子！

1958 年夏天，我的父亲在农业部被打成“极右分子兼历史反革命”逮捕入狱，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被赶出农业部宿舍，迁往西便门城墙根下面临时建成的专为反革命家属集中居住、类似拘留营的简易平房里。

曾几何时，我们十分为之自豪的“革命之家”，转眼间变成了可耻的“右派之家”，而且四分五裂，天各一方！

父亲被捕前是国家十一级干部，我们兄妹本是“高干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子女”！

在劫难逃

1957 年下半年，我们北京九中的九个“右派分子”暂时在学

校菜地劳动，等待处理。

我虽还教初三一个班的化学课，但工作轻松多了，工资也未动。学校菜地活也不多，除了学生有时围着看热闹，自觉成了动物园的猴子，有些别扭外，感到当右派似乎也没什么可怕！

因为已揪出的右派人数未达到 10% 的比例，到寒假期间再“补课”，再抓了两个达到 11 人。

1958 年 4 月 30 日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对我们 11 个右派的判决处理：一个极右分子开除公职押往劳改农场强制劳动。两名二类右派保留公职，取消工资，每月发放 18 元生活费，送往农村监督劳动，其余八名右派为第三至六类，分别降级降薪，亦送往农村监督劳动。

我的处理结论是：恶毒攻击党，有反党思想纲领，并参加叛徒翻案反党活动，接受批判态度较好，作为二类右派处理。

会上同时宣布那位被订为一类极右分子的老教师立即由公安人员押送劳改农场，其余 10 名右派立即收拾行李到西黄村去，与本区其它学校的右派分子一起集中编队，接受监督劳动！

开完大会回到宿舍，我完全傻了。我把自己扔在床上，脑子开始翻江倒海：“这下彻底完蛋了！我干吗要活着回国来？我干吗还要结婚生孩子？现在我拿什么去养活儿子？把担子全都压在 E 那纤瘦的肩上？……”

“E 啦？E 上哪儿啦？”我一下惊坐起来！

我看表，是该给儿子进食了，她是去托儿站了，我又无力地倒在床上。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我把自己的生死荣辱都交给了党，现在反而成了反党分子！我得找个地方讲理去啊！给毛主席写信？向邓小平申诉？向刘仁同志上书？到区委去喊冤？再找一次老校长，他是了解我的啊！”

“不行，搞不好又说我要翻案，态度恶劣，罪加一等，成为极右！那可就更完了！”

“怎么办？我怎么苦都行，E 和儿子怎么办？……”

“干脆带她俩去东北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吃野菜、野果吧！白毛女一个弱女子都没饿死，不信我们就活不下来！”

“可现在哪儿都有派出所，哪儿都要查户口，深山老林也有伐木队、护林队、勘探队……万一被发现了就成了畏罪潜逃犯了！”我看见桌上小镜框里那张我和妻儿的合影像片，像片上 E 和儿子都在笑着看我，我的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

“E！结婚刚一年多，就真得让你跟我吃糠咽菜了！儿

下转 07 版